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课题组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科学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2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深刻领会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人类绿色发展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统一性。“两山”理念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系统观,强调“不吃祖宗饭、不断子孙路”代际公平观,倡导“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全球治理观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核心思想的继承,又结合人类规律、中国实际进行了系统性创新。同时,“两山”理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物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再到自然生产力,经历了三级演进的过程。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开始关注生态问题,认为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这就是自然生产力。“两山”理念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等论断,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把自然承载力放在首位,要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能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宝贵的生产要素,把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自变量之中,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两山”理念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两山”理念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实现了从朴素生态观到系统性文明范式的升华,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一是从道德倡导到制度建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多停留于哲学层面,缺乏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升为国家意志。我国先后制定出台了多项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完善了几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将古代乡规民约中的守护责任升级为党政同责的刚性制度,实现治理主体从个人到国家的跃迁。二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治理”。传统生态智慧强调“顺应自然”的核心理念,被动适应环境承载极限。“两山”理念提出的源头防控、对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等观念,推动环境治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治理”转型。三是从局部修复到全域统筹转变。传统生态智慧注重局部修复与经验传承,“两山”理念提出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体系,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整体性推进。四是从“取用有度”的保守保护到生态与经济的动态转化。传统“取用有度”强

调对自然资源的有限索取,本质是对环境的被动节制,而“两山”理念赋予生态资源双重属性,将保护行为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两山”理念提出的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再到对生态环境反哺保护的闭环机制,摒弃了传统的机械保护观,突破单纯“取用有度”的局限,强调生态与经济的动态平衡,将生态保护成效转化为经济收益并反哺生态修复,破解了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两山”理念是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批判超越

“两山”理念是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批判。西方环境经济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认为个体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市场完美性假设的缺陷,认为市场无摩擦、无交易成本,且信息对称。三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弊端,认为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低趋高,不断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达到某个临界点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种路径本质是“牺牲环境换发展”,导致全球面临“生态赤字”。“两山”理念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是西方环境经济学长期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前者强调人类利益优先,环境为人类服务,将自然视为可供开发的资源库,从而导致生态掠夺;后者强调自然权利优先,人类需降低对自然的干预,否定发展的合理性。“两山”理念突破了对立思维,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二是西方环境经济学长期陷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两山”理念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彻底打破这一迷思,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从而实现“绿富同兴”协同增效。三是西方环境经济学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系统的外部约束,忽视了生态的文化、生物多样性等非经济价值。“两山”理念将自然生态系统视为可量化、可增值的“绿色资本”,提出了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动态转化路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框架。

■“两山”理念打破了西方生态话语垄断

“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以原创性理论为内核,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价值重构为导向,以话语传播为手段,构建了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彻底打破了西方长期主导的生态话语垄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话语范式。在理论方面,“两山”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深度融合,形成了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理论体系,彻底摆脱了对西方生态理论的依附。“两山”理念通过通

俗化表达,替代了西方“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等抽象术语,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辨识度的话语标识。在实践方面,西方生态话语长期陷入发展与保护对立的困境,认为经济增长必然污染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两山”理念通过中国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是辩证统一而非矛盾对立的关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同共进,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绿色发展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两山”理念的实践成效彻底打破了西方发展与保护“对立论”话语垄断。在价值重构方面,“两山”理念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明确了“生态保护”的民生属性,这一价值导向彻底打破了西方“生态保护是少数人的责任”的逻辑;“两山”理念强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追求自身发展,同时有责任保护生态环境,打破了西方“发展中国家应牺牲增长保护环境”的逻辑;“两山”理念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形态,为全球文明转型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在话语传播方面,“两山”理念通过话语输出,彻底打破了西方对生态话语的垄断,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话语”之一。“两山”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文件,成为国际生态治理的共同语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平台已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平台、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两山”理念指导下的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这些案例用“中国实践”证明了“两山”理念的全球适用性,打破了“生态治理只有西方模式”的偏见。

■“两山”理念破解了发展和保护的“二元悖论”

从国际上看,“两山”理念为全球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等挑战,“两山”理念用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协同共生,为发展中国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提供了经验借鉴。“两山”理念在不同国家、不同生态场景中得到成功应用,形成了“本土化适配”的实践案例。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认为,许多西方人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尖锐对立的两面,而中国着力于将二者协调推进,对生态文明建设怀有“坚定决心”,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南非西开普大学学者马哈茂德·帕特尔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时代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念,引领中国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之路。

从国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千万个“余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福”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

善,自然资本持续增值。各地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空气质量逐年改善,地表水水质总体向好,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提升,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实现了生态系统修复与功能提升。二是产业绿色转型,经济价值充分释放。“两山”理念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向“生态赋能”转变,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催生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制造等新兴经济形态。三是民生福祉提升,生态红利普惠群众。“两山”理念将生态改善与民生保障相结合,让群众共享生态成果。良好的生态环境降低了人民群众健康风险,城乡生态空间更加宜居宜业。同时,生态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富民产业,极大地提升了民生福祉。

天津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在生态修复、价值转化、顶层设计、区域联防联控等领域不断探索,实现了“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双赢,为京津冀生态安全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修复筑牢绿色发展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以“两山”理念为指引,构建“三区两带中屏障”生态安全格局,北部生态保护区强化水源涵养林建设,中部湿地核心区实施退耕还湿,南部生态湿地优化蓄洪功能,修复153平方公里海岸线,治理17.4万亩沙化土地,建成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同步推进盐碱地改良等,筑牢了绿色发展根基。二是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新动能。山水资源激活文旅经济,蓟州区郭家沟村以“政府+公司+农户+资本”模式发展民宿,成为乡村旅游热点;农业生态化助推提质增效,西青区王稳庄镇整合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稻田文化,打造农旅融合品牌;低碳城市培育新兴产业,中新天津生态城探索“生态+智慧”模式,构建智能科技服务、文化健康旅游、绿色建筑等产业集群,形成绿色经济增长点。三是制度创新保障长效发展。创造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回头看”。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强化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连续签订三期协议深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四是生态红利惠及民生。通过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直接带动就业与增收。西青区王稳庄镇引入高端产业,农民通过现代化种植与旅游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收入;武清区利用海绵城市技术,显著减少城市内涝,改善水环境质量,同时以生态景观与便民设施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典范。五是区域协同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天津在践行“两山”理念过程中,高度重视区域协同,通过京津冀跨区域规划、生态治理联动、制度共建等举措,形成多层次协同机制。通过区域协同,不仅提升了天津本地生态质量,还强化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为超大城市群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双赢。

(执笔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 徐瑛 丛屹 罗琼刘刚)

以绿色发展为关键着力点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张庆君 王凤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孕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已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和重要抓手。要以绿色产业体系为支撑、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为路径、科技创新为动力、绿色金融为保障,推动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一、加强绿色产业体系建设

围绕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重点领域加快布局。一方面,要突出绿色制造在传统产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加快推动重点行业工艺设备的绿色改造;加大高端绿色装备、绿色材料的研发投入,鼓励企业申报绿色工厂、设计绿色产品,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聚焦绿色能源和绿色建筑两大“突破口”,优化绿色能源结构布局,统筹推进风、光、氢等清洁能源协调发展,推动公共建筑与产业园区绿色化改造,健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提高绿色建筑在新建项目中的覆盖率。

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的绿色产业链生态,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要打通原材料—加工制造—产品流通—消费回收等各环节绿色转型的堵点,推动产业链在绿色标准下实现协同改造与重组。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绿色供应链评价体系,推动龙头企业强化环保准入标准引领,带动上下游协同减排降碳。进一步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智能化发展,强化标准引导、平台建设和协同治理,形成绿色生产的闭环体系。

二、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

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制造、绿色治理、绿色消费。首先,要深化数字技术在绿色制造中的应用,围绕节能减排等环节,加快推广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智能传感等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其次,要搭建绿色治理数字平台,推动生态环境实时监测、智能分析与预警响应机制建设,实现绿色治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最后,要加快数字技术对绿色消费的渗透,推动绿色产品智能识别、绿色信用积分兑换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

坚持双向驱动,推动绿色化与数字化相互促进。一方面,在绿色需求牵引下,加强对高能耗算法模型等的能效监管,推动新一代绿色算力等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另一方面,依托绿色制造、绿色农业等需求场景,促进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深化落地。形成绿色需求牵引数字供给、数字创新反哺绿色发展的双向耦合路径,打破传统“技术独跑”的单线思维,实现绿色化与数字化的协同发展。

加快绿色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生态+绿色转型”示范场景。首先,聚焦绿色云服务

等核心环节,打造低碳高效的算力底座。其次,要探索建设绿色数据要素交易机制,推动环境数据等资源高效共享。最后,依托京津冀一体化平台,打造“数据绿岛”,为绿色转型提供数据支撑和信息保障,推动形成覆盖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场景的绿色数字生态系统。

三、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引领

聚焦绿色低碳关键技术领域,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技术变革是绿色转型的本源动力。一方面,着力突破“卡脖子”环节,加快推进能源清洁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验证、应用推广,强化绿色技术基础研究和工程化攻关协同推进,鼓励跨界融合和多学科交叉创新,提升绿色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和产业适配能力。

着力完善绿色技术孵化与产业化体系,推动各方协同发力。一方面,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打造绿色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实现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无缝对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从“点上突破”向“链上贯通”迈进,加快构建绿色技术研发、验证、应用推广全链条支撑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设立绿色科技专项投资通道,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

完善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健全成果交易机制,提高技术转化效率。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绿色产品与技术的标准体系,提升绿色科技成果的可评估性和可推广性。另一方面,探索建设绿色技术交易平台,推动知识产权确权登记、转让交易、成果展示等功能集成,提高绿色技术市场流动性。建设区域性绿色技术交易枢纽,形

成技术转化与产业发展的良性闭环。

四、畅通绿色金融供给渠道

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一方面,要创新货币市场金融工具,拓宽绿色融资渠道。推动绿色信贷向中小微企业延伸,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升绿色融资包容性和精准性。另一方面,创新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积极推动绿色债券等新型产品落地,完善信息披露、第三方评估和产品评价体系,增强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健全环境要素市场体系,优化绿色资源配置。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环境要素交易市场体系,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化流转,构建绿色金融市场与资源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机制,提升绿色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将环境要素价格信号纳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等核心流程,将环境价值真正转化为金融价值。

强化政策协同,加强财税金融制度支持。首先,要强化绿色发展政策间协同,构建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一体化支持机制,提升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其次,完善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制,将绿色指标纳入金融机构考核体系,引导资源持续向绿色领域集聚。通过融资、资源配置和制度建设三方协同发力,推动绿色金融在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效能,为构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分别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